

## 壹、研究動機與目的

### 一、研究動機

近來國內失業率的調查，總會針對大學生就業情形進行探討，例如，大學生畢業後尋職時間長短、大學生畢業後的收入狀況、大學生未就業或失業的原因，這樣的議題往往凸顯了大學生從教育至就業（from education to work）的不盡如意之處。甚至，有企業在徵才時，指定要聘任國立台灣大學的畢業生負責提皮包或擔任司機的工作，對此，各方社會輿論正反意見雜陳（朱立群，2010），可能忽略大學生對自身生涯價值觀的堅持或選擇，更是其終生所面臨的重要問題，與生涯決定密切相關（Hartung, Lewis, May, & Niles, 2000; Pascarella & Terenzini, 1991）。

因生涯價值觀往往需同時考慮自己的需求及社會的期待，通常在諮商與輔導的討論範疇，多由個體微觀層次來分析其生涯價值觀，例如，探討個體之人格特質、生命發展或角色分化歷程等（黃慧雯，2002；楊淑涵，2002）；或進行量表測驗，如「生涯區分量表」、「生計決策量表」、「職業探索量表」等（王玉珍、吳麗琴，2009；何幸娥，1993；林幸台，1993；林蔚芳，1996；金樹人、林清山、田秀蘭，1989；許宏彬，1997；劉鳳珍，2005；Downing & Dowd, 1988；Petrick, 2002；Sepich, 1987），但有關生涯價值觀的議題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連結或對應，則較為缺乏。

事實上，不可忽略的是，在心理學研究領域其中一個分支主要在探討自我（self）的發展與社會過程（social process）之間的連結，亦即，自我係在社會建構當中形成的系列性概念所組合。此討論範疇中的自我有幾個特點，包括：自我的觀看者為集體、有互動的傾向、自我屬於某個社會類別（social categories）、對於自身所屬團體的認同感、具有互賴與集體的背景面向，進而表現出集體認同、趨向、社會層面的自信、包含他人的社會團體、社會階層等（Luzzo, 1991；

Markus & Nurius, 1986; Robins, Tracy, & Trzesniewski, 2008: 426)。換言之，個體的生涯選擇或期待的形塑仍有社會因素之作用。

若是說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或情境對其生涯價值的選擇有所影響，那麼，進一步值得探問的是，哪些因素將造成主要的影響作用？如果說個體所處的社會情境脈絡對其職業階層位置等具有影響效果，那麼，生涯價值觀此心理層面的選擇議題，是否也受到背景變項之影響呢？基於此，本文希望能對這樣的議題加以探討，此將有助於兩方面的釐清：其一是，生涯價值觀雖然是個體個人所做之選擇，但是否能夠全然擺脫背景變項的左右；其二是，如果我們能夠更仔細地辨識影響大學生生涯價值觀的背景變項，那麼，在面對或輔導大學生生涯議題之際，我們可以有更全面的觀察與看法，來提供更為適切的回應，而非僅關注於個體層面因素，卻忽略了社會層面因素的作用。

根據諸多社會流動實證研究發現，高度工業化與專業化的社會中，職業地位為個人社會階層位置高低的最佳衡量指標。個人的社經背景變項影響著教育成就與畢業之後的職業成就（Alexander, 2001; Allmendinger, 1989; Blau & Duncan, 1967; Bowles & Gintis, 1976; Coleman, 1966, 1968; Hearn, 1991; Kerckhoff, 2001），此為探討教育階層化的主要論述。在台灣社會的實際脈絡中則發現，台灣高等教育階段不同學生因社經地位背景所形成的階級差異，並不見得可經由進入高等校院就學而獲得緩解（林大森，2006；孫清山、黃毅志，1994，1996；張建成，2002；章英華、薛承泰、黃毅志，1996；彭森明，2005；黃毅志，1990；楊瑩，1988；蔡淑鈴、瞿海源，1992；薛承泰，1995，1996），而且持續影響大學生職業階層位置的取得情形。這個探討脈絡凸顯了教育歷程對於個體階層位置的影響結果；但是，個體在判斷生涯傾向的「過程」，即大學生的「生涯價值觀」之形塑是否亦存在著背景變項之作用？雖然有諸多有關生涯選擇或規劃之量化調查成果，如林清文（1994）、楊智馨（1997）、田秀蘭（1998）、袁志晃（2002）、Tien、Lin與Chen（2005）也提及背景變項的設計，但其研究中所指的背景變項多數為性別、學校性質、學校